

# 告别昨天

## ——当代中国农村的蜕变

马宪平 浦卫忠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告 别 昨 天

——当代中国农村的蜕变

马宪平 浦卫忠 著

(京)新登字 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昨天—当代中国农村的蜕变/马宪平,浦卫忠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5

ISBN 7-5074-0822-1

I. 告… I. ①马…②浦… II. ①农村-社会发展-概况-中国②农民-概况-中国 N. D4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874 号

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100013)

电话:4235833 传真:4214573

责任编辑:李青

封面设计:力中 责任印制:张建军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 8.00 元

## 序

当着众多的学者日益关注城市生活时，青年学者马宪平同志和浦卫忠同志却把研究的视点投向农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家庭、婚姻与生育、农民的消费生活以及当代农民的生产方式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这部著作就是他们辛勤研究的成果，这是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很值得从事农村共青团工作的同志一读的。

温家宝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民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农村安定、富裕，国家才能稳定和发展，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权，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农村改革和建设，并指明了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推动了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重视解决农民问题，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求是》1995年24期）正是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就北京郊区而言，1993年

末,京郊集体积累总额达 28.13 亿元,集体资产总量已超过 300 亿元;而 1993 年京郊农民人均劳动所得已达 2221 元,其中大兴县农民人均劳动所得为 2892 元,而近郊的石景山区,农民人均劳动所得为 3379 元。农民收入的增长,标志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京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显示了现代农业的茁壮生命力。仍以 1993 年为例,京郊农业的规模经营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高质、高效、高产的“三高”型规模农场,一批种植业、养殖业企业开始向现代农业企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由农业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江泽民同志 1995 年 11 月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顺义县 50 万万人,现在只有 6% 的人从事农业,其他的人从事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设备很先进,加工水平较高。这些都说明了农村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学者,应当把社会的变化揭示出来。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农村的发展变化将会更大。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社会的发展,关注当代农村和当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要更加关注我们的农村青年。

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王 宁

1996 年 3 月 19 日

# 前 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举世公认的。农村的经济改革首当其冲，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农村社会发生了令人惊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衣足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尽管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村经济在封建社会中逐步得到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触动，增加了与城市的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形式，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改变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业结构，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小农经济的意识和观念。从当代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观念，以及生产观念、生产行为和方式来看，确实确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们正在潇潇洒洒地与他们的昨天告别。

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效，是人们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被商品经济意识所替代。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一旦人们从自给自足的经济中“脱颖而出”，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时，他们顿时感到面前展现的是一个无比广阔而又无

比崭新的世界。世代依靠黄土地而生存的中国农民，在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上经过一番徘徊之后，终于发现，在自己面前，还有那么多的生存之路，于是埋藏在心底的希望被激发起来了，他们开始躁动起来，开始脱离曾经被祖先们视作生命之根的黄土地而走向城市，农民的身份不再是禁锢他们的锁链。中国当代的农民有了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

于是，农民大军开始涌入城市。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就象一个沉睡多年刚刚苏醒过来的巨人，一切事情都要人去做，一切事情都等着人去做，这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精明的农民，在城里人似乎还没清醒过来时已经捷足先登地叩开了城市的大门。阿里巴巴的宝库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宝藏奉献了那些勇于开拓和进取的农民。城里人开始享受到农民进城的好处。城市建设、危房改造、家庭服务，几乎到处都有民工们的身影。民工们构筑着他们自己美好的未来，城市也在他们的构筑下一天天地漂亮起来。

说农民进城是农村改革的一大变化，那么，农民进军科技圣殿，把视角转向国外进军国际市场，则更标志着农民们开始向传统农业经济告别，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他们走进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深墙大院，向科研人员要科研成果转让，使高科技的产品在乡镇企业中结出了硕果；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种田的方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当无数学子还在孜孜不倦地做着托福梦时，农民们已经开始了远征俄罗斯等国的劳务输出，在异国他乡办起了企业。农民们不仅胆子大了，步子迈得大了，眼光也看得远了，“有了温饱，自然就有了温饱以外的追求”。农民们开始重新设计自己，为自己勾划更美好的五

彩人生。对已经驱赶走饥饿魔影的现代农民来说，人生的意义不再是体现在造房、娶妻、生子，而在于“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几个字眼，在前几年如果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不仅会使人感到生涩，更会使人感到大惑不解，而今这一切再不是什么城里人、文化人的“专利权”了，农民们也要干一番事业，要到外面去闯世界。在一些靠近城市的农村，经济收入偏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日益趋近城市居民，价值观念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开始注重生活的节奏、生活的质量。

我国的乡村和城市长期分隔，有人把它称作“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又继续为消灭城乡差别而努力，但几十年后，我们看到到的不是这种差别的缩小，而是这种差别正从无形到有形，越来越显著地将城里人与乡下人分隔开，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使中国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大板块，把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性地留在了农村，从而保证了城里人的一切“特权”。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是无比强烈的，于是，改革开放一打开大门，农民便迫不及待地涌向城市。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改革正在使城乡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却由中国的经济改革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有人作了一个估计说：目前在城市做工的农民至少在1500万以上，进镇落户的农民也有几百万。这种估计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不要说长期在城里做工的农民如小保姆、合同工，冬去春回的农民建筑大军，单是那春节时挤满了火车站、轮船码头被称为民工潮的农民工，



就足以告诉我们，这1500万是一个缩小了许多倍的数字。我们认为：城乡差别的缩小，不仅在于打破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而且在于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人的素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进入城市，确实加快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但我们也看到，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使本来拥挤堪的城市变得更加拥挤，而且，农民们在城市所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所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是一些出大力、流大汗的工作。如果说农民大军进入城市是用他们的力气来一点一点地积聚财富，实现他们的富裕之梦，那么，我们说这种意义上的“缩小差别”只是最原始意义上的，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诱惑与熏染，但从他们一跨入城市的大门，他们身上的农民烙印就使他们与城里人远远分隔了开来。他们看到了城市文明，但却无法进入，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不过的痛苦。使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农民，并不是说拥有一两座高级的、装潢华丽的、别墅式的家庭住宅楼，也不是说家里有了现代化的电器设备和拥有一部小汽车、几部拖拉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表明城乡之间的差别已经缩小。农村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关键在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于农民拥有自己的科技人才。许多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国家统计资料来看，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高中生很少，农民们希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上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以有更大的发展。把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是一回事，本身能否拥有高科技又是一回事。尽管农民们可以筑起凤巢，引来城里的凤凰；叩开科研机构的大门，迎来城里的科技

人员,但这代价也是相当昂贵的。

农民似乎还有更深的忧虑,那就是土地并不能使人致富,所以不少人只是把种地作为一种“保留节目”,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兼业,出外挣钱。离开黄土地,仍然是许多现代农民的愿望。我们用不着杞人忧天,担心将来农民都脱离了土地,就再也没有人种地了,我们眼前不会出现满目荒凉的颓败景象。但是,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土地吝啬,不肯下大力气,只注意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忽视了种植业本身的现代化,那么,在中国大地上,传统的小生产模式也许会延续得时间更长,那种大规模的集约化、机械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将会滞后出现。那时,所关乎到的就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了。

当然,历史只是告诉了我们过去,至于将来,却是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去创造的。

# 目 录

当代农民的家庭 .....	(1)
大家庭与小家庭 .....	(1)
农民家庭观念与家庭功能的转化 .....	(10)
农村家庭关系 .....	(20)
农村家庭问题 .....	(27)
转型社会中的农民 .....	(37)
流动,走出黄土地 .....	(37)
科技兴农 .....	(46)
青天一顶 黄土依旧 .....	(54)
当代农村的婚姻与生育 .....	(67)
农民的择偶标准与择偶心理 .....	(67)
农村婚姻现象 .....	(76)
非法婚姻与婚前性行为 .....	(83)
农村的计划生育 .....	(90)
当代农民的生活 .....	(97)
农民的饮食消费 .....	(97)

农民喝上了自来水 .....	(104)
农民的衣着消费 .....	(109)
农民大造屋 .....	(117)
信息, 生活环境与农民小康 .....	(124)
当代农民的生产方式 .....	(132)
兼业农民与高产优质高效 .....	(132)
农民经商与商品性农业 .....	(146)
农民的富裕之路 .....	(157)
农村社会与农民教育 .....	(167)
农民的业余生活 .....	(167)
农村教育 .....	(179)
农村宗教活动的复苏及影响 .....	(191)
参考书目 .....	(201)
参考论文 .....	(202)

# 当代农民的家庭

## 大家庭与小家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家庭只是生活的消费单位,家庭中的成员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生产计划、安排由集体经济组织落实,农民们只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投入自己的劳动,而收入则是根据他每年劳动工分的多少来分配的,这样,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历史在这个时期划上了一个句号。

人们一般认为:“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家庭生活首先是一种经济生活,家庭成员间的联系是基于婚姻,血亲基础上的经济联系,人们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作用,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差别的反

映”。<sup>①</sup> 家庭结构的变化，固然受制于人们价值、道德等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的前提下，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给每个社员家庭，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家庭作为生产的经营、组织单位的职能又恢复了，它的独立性显现了出来。有了生产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安排劳动力和支配劳动时间，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生产的好坏与生产者——家庭的利益直接挂上了钩，生产者更加关心生产；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市场情况来安排、组织生产，以获得更高的效益。这样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国农村家庭的结构规模也发生变化。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家庭模式是大家庭，当今是小家庭。并且指出：大家庭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的。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人数必须众多，才能有较大的力量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发展生产，维持生存。但也有人指出，大家庭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种主要的家庭结构模式，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以及宗族百口的家庭，并不是普遍的。对于上古时家庭结构模式，我们可以从孟子的一段话中窥测一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那时的家庭最多不过三代八口。自战国时代到

---

<sup>①</sup> 朱枫：《家庭属性初探》，《婚姻家庭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3页。

民国,我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目,大体在5人左右。《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之论说:“今(战国时——引者加)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云梦秦简《封殓式》中的“士伍”甲的家庭中有妻、女、子、奴、婢各一。《封殓式》是秦王朝供官吏学习的法律文书程式,所以可以认为其所述家庭人口数目是有代表性的。汉代以后大略都有户口统计数字,兹列表如下:

公元(年)	朝代	每户平均人口①
2	西汉	4.87
105	东汉	5.77
280	西晋	6.57
464	南朝刘宋	5.17
609	隋	5.17
705	唐	6.03
1006	宋	2.19(未计算妇女)
1291	元	4.46
1391	明	5.31
1911	清	5.17

另据1926年《中国人口问题》所载江苏江宁480户农民调查,平均每户为5.5口;1933年北平283家调查,平均每户为4.6口。②可见中国家庭规模一直在4—6人之间。

1949年以来,中国的家庭规模一直保持在4~5人左右,较之1949年以前,有缩小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53年、1964年、1982年中国家庭规模分别为4.30

① 数字来源,据梁文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引自(日)清水盛光:《支那家庭的构造》。

人、4.29人、4.43人。1982年，河北大学哲学系师生在河北定县东庞庄公社进行调查，该公社共有3360户，总人口为14545人，平均每户4.32人。又根据浙江镇海县峙头乡中宅村的调查，该村1952年土改时，共有76户、328人，户平均人口为4.3人；1972年，全村132户、586人，户平均人口为4.4人；到了1982年，全村180户、668人，户平均人口为3.7人，其中2~3人之家68户，占全村总户数37.78%，4人之家61户，占33.89%，二者相加为71.67%。可见4人之家是农村最主要的家庭结构模式。

近年来，由于农村的改革和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农民家庭的规模日益缩小。据对湖南桃源县同仁村的调查，从1982年到1990年，同仁村总人口从1094人增加到1100人，但家庭户却由278户增加到330户，平均规模由3.94人下降到3.30人，3~4人户成为家庭结构规模的主体。同仁村的家庭规模发展趋势，与1990年湖南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基本相符：湖南省农村家庭平均规模由1982年的4.27人，下降到1990年的3.86人。而1990年上海松江县4村调查也表明，在调查的4村132户中，最大的户不超过6人，而6人户只有12个，占总数的5%不足；1~4人户95个，占总数的71.97%；平均家庭规模3.93人。这都可以说明，农村家庭近年来已经日渐趋小，家庭的分化加快。

社会学家李景汉1958年曾在北京近郊农村家庭作了一次调查，他在谈到大家庭制度时说：兄弟分居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从今日社会的一般发展来看，大势所趋的不是大家庭的维持，而是小家庭的兴起了。在现有的大家庭中，有的壮年成员把劳动力弱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看作是一种负担，想



把他们分出去,所以有很多的老年人感觉到生活的凄凉。<sup>①</sup>他在这里谈到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家庭变革。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再加上分配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诸如公积金制度、五保户制度等等,家庭的“生有所育、老有所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父辈与子辈在道德、价值观念上不能完全沟通,许多青年农民独立门户,从老的家庭里分化出来,这样,核心家庭逐步增多,主干家庭有所减少,但稳定在一定数量上;联合家庭则迅速减少,解体。应当指出,农村中的大家庭比起城市来还是多一些,这是由其特有的社会环境、生存方式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的规模结构经历了小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大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网络家庭这几个发展阶段。据全国14省市农村家庭结构类型调查,1978年时,核心家庭占总数的65.4%,主干家庭占总数的23.6%,联合家庭占2.9%。到了1986年,核心家庭上升到73.8%,主干家庭下降到17.0%,而联合家庭下降至1.1%。可以看出,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核心家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主干家庭比率下降,联合家庭趋于消亡。核心家庭为什么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大量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它适合于核心家庭这样的小家庭。无论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活动的计划与实施,产品的分配,核心家

---

<sup>①</sup> 李景汉,《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三联书店1981年12月出版,第85页。